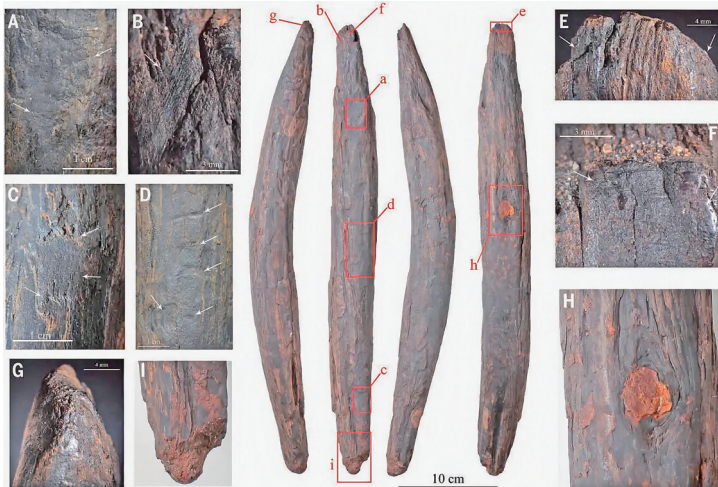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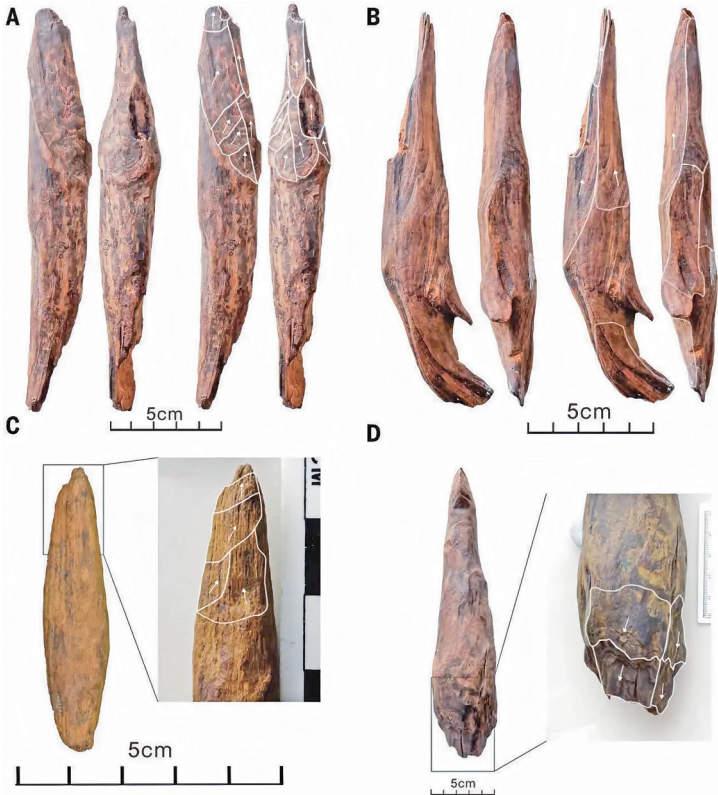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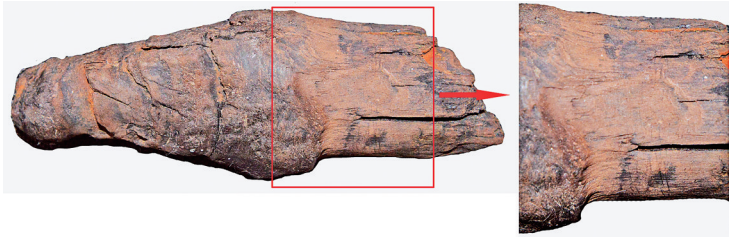
考古队员在用考古测量仪测量标本



木器加工和使用痕迹



木器加工示意图



有加工痕迹的木制品

江川发现约30万年前木器

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木器研究的空白

一根看似不起眼的“木铲”，可能是30万年前古人类的“挖野菜神器”？7月4日凌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甘棠箐遗址的最新研究成果登上国际权威期刊《Science》：35件保存完好的古人类木质，其年代距今约30万年。这项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木器研究的空白，更为全球古人类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

约30万年前的木头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区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抚仙湖南部。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9年曾进行了考古发掘。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玉溪市、江川区文物管理所再次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

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石制品25153件，其中石核658件、石片564件、石器192件、废品（含断块、断片和碎屑等）23739件；出土骨制品28件、木制品30件，木制品的发现不但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也是当时世

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木制品。2018年至2019年，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木质材料、植物种子。

木质材料能保存至今，得益于甘棠箐独特的地质环境。遗址地层属于古抚仙湖湖岸的河湖相沉积，埋藏于富含有机质的黏土之中，环境长期饱水、缺氧且稳定，为木质材料的保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天然条件。通过动物群分析、古地磁、光释光、电子自旋共振及铀系测年等多项技术交叉验证，研究团队将遗址的地质年代精准确定为中更新世中期，距今约30万年。

35件木质遗存确认是古人类“做”出来的

遗址共出土近千件木质材料。经过工具形态、加工及使用痕迹等的观察分析，并与针对性模拟考古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研究，最终确认35件木质遗存为人工加工工具。

这些木制工具大小不一，形态多样，其尖部形态可分为凿尖状、铲尖状、锥尖状、钩状和凸缘状等。其中19件工具保留明显的削枝修形痕迹，17件工具在尖端留有使用后的磨光、条纹、纤维断裂及木质破损等痕迹，且这些痕迹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与功能指向性。部分木器尖端和器身还保留充填土壤与植物残留物，证实为古人类实用工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两件需双手持握，形似大型挖掘棒，还有4件钩状工具可能用于切断植物根系，其余标本则是可单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

于旧大陆西部遗址出土的

大型木器（以狩猎工具为主），甘棠箐的木质工具种类更丰富，尤以小型单手持握的木器为主，反映了生活在此地的古人类在木材选择、功能性刃部预制方面具有前瞻性和计划性，能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制作不同形态的工具。研究还揭示，生活在甘棠箐的古人类在亚热带环境中以植物资源为重要食物对象。

甘棠箐的木器组合显示了有机材料作为旧石器时代加工人工制品的重要性，它们的制造技术与东亚和东南亚发现的石器明显的“原始”性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木制工具可能在东亚中更新世古人类的生存和环境适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棠箐木制品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时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

约30万年前的古人类已具备较强的工具制作能力

多学科综合研究表明，甘棠箐的古人类生活在一个温暖潮湿的热带、亚热带环境中，这里湖泊、草地、灌丛、森林交错构成复合生态系统。除了木制品外，遗址还出土了石器、软锤和保存有切割痕迹的动物化石等文化遗物，充分展现了古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甘棠箐遗址文化层中发现的松子、榛子、猕猴桃、葡萄等植物果实（种子），以及遗址周边古环境中生长的苋科、商陆科、葫芦科、蕨类、莎草科、禾本科、泽泻科等植物所具有的可食用叶片、种子、球茎与根茎等植食资源，对研究古人类采食植物对象、行为方式和食谱组合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与信息。

研究还首次揭示了中更新世古人类对湖岸资源的认知能力与开发策略——他们会携带专门制作的木质挖掘棒，在合适的季节前往湖滨地区，有针对性地采集地下块茎。这表明，约30万年前的古人类已具备较强的资源判断力、季节性规划能力与工具制作能力。

这一发现首次为“植物根茎类食材在史前食谱中占有重要地位”提供了确凿证据，也反映出东亚古人类独特的环境适应策略。该研究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本报记者 杨质高 文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